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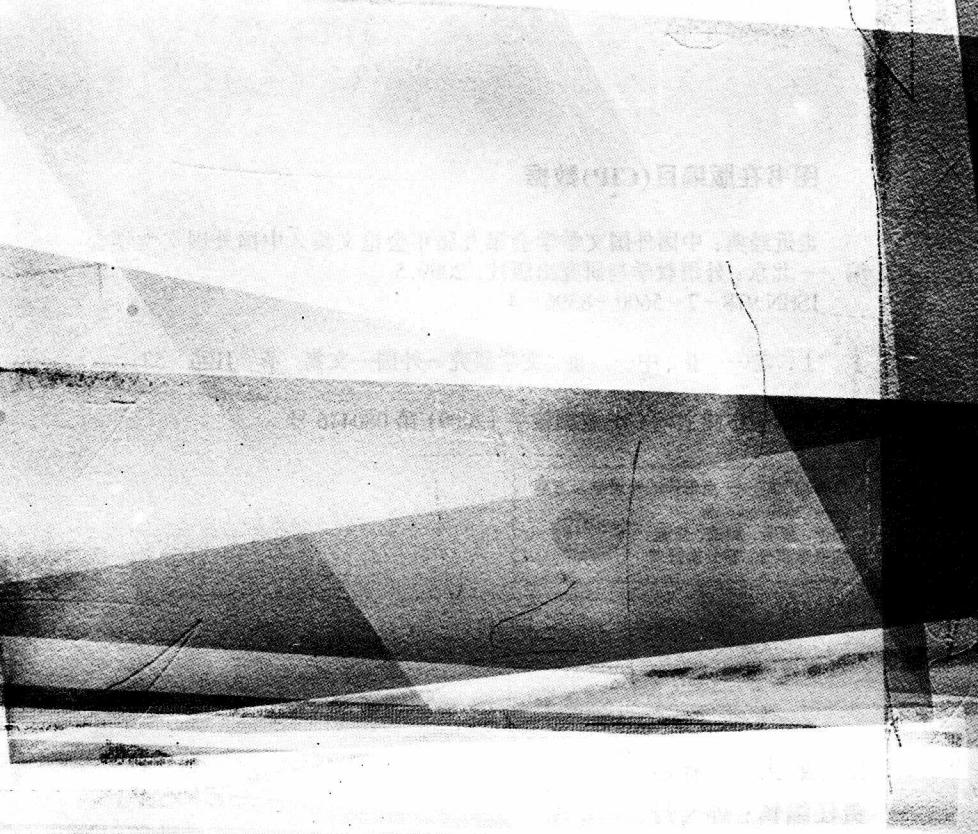


走近经典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 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走近经典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 编
董洪川 执行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经典：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 /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编.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600-8396-4

I. 走… II. 中… III. 文学研究—外国—文集 IV.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0446 号

你有你“优”——点击你的外语学习方案

www.2u4u.com.cn

阅读、视听、测试、交流
购书享积分，积分换好书



出 版 人：于春迟

责任编辑：孙 丹

封面设计：孙莉明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http://www.fltrp.com>

印 刷：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12.5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00-8396-4

定 价：32.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物料号：183960001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 开幕词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陈众议

各位同行，各位朋友：

在这秋风送爽之际，我们撇下诸多难违之约、难却之情，集聚在这诗韵缭绕的巴山蜀水之间，真的非常难得。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对诸位的光临表示由衷的感谢。

自成立以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已经走过了三十个年头。从冯至、季羨林到黄宝生，许多外国文学界的前辈、同道，为学会的发展，为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研究、教学和出版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是他们和在座诸位的坚持不懈与无私奉献，成就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的昨天和今天。本人不才，却愿与诸位并通过诸位，团结全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尽心竭力，为守望和发展我国的外国文学事业、滋润和繁荣华夏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今天和明天，我们将围绕大会主题“走近经典”开展讨论。众所周知，经典的最初涵义来自宗教。《圣经》对于基督教是经典，《古兰经》对于伊斯兰教是经典，《论语》对于儒教是经典（如果儒学可称之为教的话），依次类推。然而，今天所谓的经典，其所指已经非常宽泛，而且常常因地而异、因人而异。过去，我们也许可以把某些现象、流派或主义的代表作界定为经典，比如从荷马史诗到《尤利西斯》。但时至今日，恐怕谁也无法再用什么主义或流派来概括世界文化了，当然更加无法借三言两语来描述它纷杂无序的状态。这是因为世界文化已经进入了无主流大汇唱时代，也即自由的时代、相对的时代、多元的时代、个人主义的时代。这使得不少人以为经典被解构了，不复存在了。它们像“上帝”那样从众生仰视的神殿上走下来，

并且正在走向人性赋予它们的另一个极端：纯粹的个人心志和情感。这很大程度上契合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价值取向。而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则几可称作它的极端个人主义宣言。

然而，生活在我们这个还有国家、民族之分，是非、正邪之争，强弱、美丑之别的世界里，除了要有一般的真理观，还需要有起码的价值标准、道德伦理、审美诉求和行为规范。这恰恰也是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或可使人处变不惊。

因此，在我看来，经典应该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是各民族基本价值观和审美方式的反映，因而也是各民族特性的核心因素和基本认同的情感纽带。这种核心因素和情感纽带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它们既是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基础，同时也是使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精神基因。大到世界观，小到一般生活习性，经典起着精神基因的作用。换言之，不同民族的文化由于这些经典而具有相对独特的染色体。这种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的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自己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鲜明个性。然而，也正因为这种不断变化的和不可淹没的个性，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才变得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他者研究和了解、交流和借鉴。古人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经典也罢，文化经典也罢，归根结底是精神产品，是一时一地的人心、民心的集中体现，是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的认识观、价值观、审美观的综合反映。因而，它们常常是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也是人类文化生态保持丰富多彩的基础。

另一方面，无论多么高级、多么社会，我们总还是动物，有一切动物的基本根性。我们之所以高级则恰恰是因为我们具有超乎其他动物的认知水平、审美水平、工具制造和使用水平，等等，以及更为丰富复杂的情感和情感表现方式。而这些都是后天的，是需要经过传承、修养才能够达到的。狼孩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点，人类和果蝇两种基因图谱的相似性也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是后天的，文化（经典）的传承和感知也就变得非常重要。尽管程度不同，当我们吟诵“正是江南好风景，落

花时节又逢君”或诸如此类的名句时，想到的感到的或萦绕于潜意识的便不仅仅是两句诗几个字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情感的、认知的、价值的、审美的共鸣，其背后则是整个中华文明。

这是最为概括的一种说法。而事实上经典的复杂性是人性之复杂、社会之复杂的最好见证。

有了前面的概括和界定，我想接下来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释了。首先，时代变了，过去意义上的经典在今人眼里并不一定还具有经典性。除了前面说过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网络。网络的虚拟性直接破坏了传统经典的界定标准，比如真、善、美。众所周知，真善美的基础是真。没有真，善和美便无从谈起。我想，网络文化的虚拟性对经典的冲击当不亚于前面提到的极端个人主义风尚。

此外，虽说遴选经典的标准和途径有很多种，而且并不一定都能殊途同归，因为经典的界定终究也是因人而异、与时俱进，而非一成不变的（比如说，没有王国维、俞平伯等几代学人的解读，就没有我们今天认知中的《红楼梦》；反之有些曾经被认为是经典的，也许今天已然不是或不那么经典了），何况许多经典的产生是因为反经典。但重新界定也罢，否定或否定之否定也罢，平等、友好和互相尊重都是我们讨论的基础。

最后，祝大家健康愉快，并让我们用真诚的掌声感谢东道主四川外语学院的大力支持。

2007年10月27日

目 录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词	陈众议	i
------------------------	-----	---

【文学经典理论】

经典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以《堂吉珂德》为个案	陈众议	1
重视经典，谨防经典主义	叶廷芳	17
圣经：通向文学经典之路	梁 工	23
T. S. 艾略特与“经典”	董洪川	37
经典小说应有的内涵与价值		
——透过昆德拉小说诗学反思西方小说		
经典	张 弛	54

【文学经典重读】

谈经典短篇小说的重新阐释	申 丹	69
激荡的岁月 脆弱的灵魂		
——帕斯捷尔纳克与小说《日瓦戈医生》		
新析	吴晓都	80
走向了经典		
——复读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	李昌珂	91
文史互证与诠释的限度	张旭春	100
灵魂的撕扯与爱略特小说的内在矛盾	杨莉馨	118
夏目漱石代表作《心》的重读		
——兼谈夏目漱石与森鸥外对“明治精神”		
的认识	关立丹	132
艾略特《荒原》的时空主题研究 ...	刘立辉 林玉蓉	142
佩涅洛佩的纺织和梦		
——论《奥德赛》的女性主义	陈戎女	155

整体存在的虚妄与个体存在的盲目

——对长篇小说《切文古尔》的深度

解读 谈修安 169

【文学经典与民族意识】

中国文化视野和托尔斯泰经典的重读 吴泽霖 181

关于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的再认识 汪介之 198

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 朱振武 213

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中的大英帝国形象 ... 谢江南 225

英国文学中的小史诗 邓亚雄 237

【文学经典的时代性】

1988 年以来苏联 / 俄罗斯文学界对肖洛霍夫的

边缘化 刘亚丁 253

当神圣已成往事

——世纪之交“钢铁热”之反思 何云波 266

俄苏“红色经典”在当代中国 陈建华 沈喜阳 281

爱默生的重要隐喻：多功能的“透明的眼球”

..... 隋 刚 296

“星星”和“米饭”

——高银早中期诗歌创作的抒情性与

历史性 吴允淑 306

论西方文学中传统与现代的互动关系 周明燕 317

【文学经典的传播与教学】

关于建设 20 世纪西方文学史教材的研究

..... 聂珍钊 327

谈外国文学经典的教学 王守仁 345

论梁实秋与莎士比亚的亲缘关系

及其理论意义 李伟昉 352

爱国主义的担当责任与文化传播的使命意识	
——杰出翻译家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	
戏剧探微	李伟民 365
萨缪尔·贝克特的研究与翻译	
——兼评余中先译《无可名状的人》	曹 波 377
编后记	387

经典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西 ——以《堂吉珂德》为个案

陈众议*

摘要：经典何以成为经典？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自然无意也无法替这样一个遮天盖日的抽象问题给出定论，却试图通过《堂吉珂德》这一部经典的产生或经典化过程，探究其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并借以论证其所以成为经典的某些决定因素，比如它的一系列二元关系。

关键词：经典 偶然性 必然性 二元论 《堂吉珂德》

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甚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但奇怪的是，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经典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改写，也不断地在改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奇怪的是，如果没有塞万提斯，又会有谁来创作《堂吉珂德》呢？

首先，文学是由作为个体的作家创造的（这就十分偶然），其历史的“生成”因为个体的不同而具有明显的偶然性和不可预知性。其次，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既源于现实，又指向现实；既耽于想象，又超乎想象（或谓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情理之中而又意料之外）；既具有时代的认知、价值和审美高度，又不乏这一个作家的个性化取向，因而是不可再造的。

本文拟以《堂吉珂德》为个案，对这一文学经典形成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及一系列二元关系略呈管见。

* 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人类历史的必然进程中充满了偶然性。这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就曾说过，其“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①然而，文学与历史不尽相同。比如，没有曹雪芹，便没有《红楼梦》；没有《红楼梦》，中国文学的历史便不再只是加速或延缓的问题。对于西班牙文学，塞万提斯和《堂吉珂德》具有同样的意义。这或可说明文学这种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也或可说明文学经典的偶然性。诚然，这种偶然性并不能否定时代社会中的这一个人（包括其认知方式和创作方法，等等）的某种必然性，因为人终究不能拽着自己的小辫离开地面。于是，偶然与必然分明构成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复杂关系既源出又决定了文学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或非经典）的复杂性。同时，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又绝妙地反射出时代社会有所偏侧、有所扬弃及此过程所隐含的特殊的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如今，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无中心”、“多元化”情态不正契合了二元论“解构”之后“不分你我”、“不分西东”的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即跨国资本的一元化）态势吗？

就《堂吉珂德》而论，都说它为骑士小说敲响了丧钟，但事实并不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骑士小说的戏仿确实意在为后者掘墓，同时却无意地为后者树起了丰碑。无论作者如何信誓旦旦地说他写《堂吉珂德》是为了把骑士小说扫除干净，但事实证明它非但没有将其扫除干净，反而因为自己的不朽而使后者获得了永恒。这就像一把双刃剑，或者一枚钱币的两面。用博尔赫斯的话说，不是先人繁衍了后人，而是后人使先人得到了复活。^②当然这是形而上学的一种说法。辩证地说，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换言之，批判和继承、继承和创新在《堂吉珂德》这部经典小说中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一、《堂吉珂德》与骑士小说

欲识《堂吉珂德》，必先识骑士小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其原因至少有二：

(一) 塞万提斯在《堂吉珂德·序言》中开宗明义，谓其“目标是消除骑士小说的影响及世人对它的痴迷”，其方法则是充满讥嘲的戏仿：“不久以前，有位绅士住在拉曼恰的一个村里，村名我不想提了……这位绅士闲来无事（他一年到头几乎总是无所事事），就埋头看骑士小说，看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简直把打猎啊、打理家业啊忘得一干二净。他如此刨根究底、痴迷于斯，竟不惜变卖良田去买骑士小说，把能到手的统统搬回家来……可怜他被那些花言巧语色迷了心智，常常彻夜难眠，一心只为探究个中奥秘而苦思冥想……长话短说，他钻进书里，从早晨到夜晚，从黄昏到黎明，不能自拔。他这样没日没夜、了无休止，终于脑汁枯竭，失却了理智……总之，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性，以至于冒出一个世上最疯癫的荒唐念头：为报效国家、扬名四方，他应该也必须效法书中骑士，去行侠天下……”^③

(二) 塞万提斯对骑士小说的看法并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就是说，他的批判是一种扬弃，即批判中有继承。

首先，塞万提斯并非反骑士小说之第一人，骑士小说也并未因《堂吉珂德》的问世而销声匿迹（传统塞学在这一问题上不无偏颇）。早在 16 世纪 40 年代，西班牙教士加斯帕尔·卡尔迪略·德·比维利亚尔邦多就向骑士小说发起了进攻，谓骑士小说和新教一样害人匪浅。他因此而在特兰托教务会议上声名鹊起，并于 1557 年在塞万提斯的故乡出版了《理论学大全》。该书的最大亮点在于揭示骑士小说的巨大危害，即它不仅在市井阶层广为流布，而且还是僧侣阶层的案头读物。此后，路易斯·比维斯、梅尔乔尔·卡诺、阿莱霍·维内加斯、佩德罗·梅西亚、阿隆索·德·乌利奥亚、路易斯·德·格拉纳达、贝尼托·阿里阿斯·蒙塔诺、佩德罗·马隆·德·查德等西班牙学者、作家都曾揭露过骑士小说的荒诞不经。而塞万提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堂吉珂德》的，因此一直被视为“官方作家”、“罗马教廷的忠诚儿子”。这种看法主要来自 19 世纪海涅等欧洲经典作家和西班牙学者梅嫩德斯·伊·佩拉约有关观点所从出的塞万提斯同罗马教会、西班牙当局的关系。1905 年，梅嫩德斯·伊·佩拉约

引经据典，大做文章，论证了塞万提斯与西班牙当局及宗教法庭的“特殊关系”，并得出结论，认为塞万提斯是“官方作家”，他所接受和宣扬的也“主要是官方意识”。为此，梅嫩德斯·伊·佩拉约考证了“特兰托教务会议”之后产生了大量反骑士道作品，其中有：佩·梅希亚的《帝国史》(1545)；卢·梅希亚的《闲散论》(1546)；富恩特斯的《自然的哲学》(1947)；格拉西安的《道德论》(1948)；奥维多的《致巴利阿多里德法庭》(1949)；卡诺的《神学》(1563)；蒙塔塔的《修辞学》(1569)；格拉纳达的《信仰》(1582)；查依德的《玛格达莱娜》(1588)，等等。^④

此后还有措辞更加激烈的《家书》(巴尔德斯，1603)和《圣赫洛尼莫教团史》(西昆萨，1605)等。而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恰恰是在这个时候，经当局(书检机关)审查批准的第一部“反骑士小说”。难怪塞万提斯难脱“官方作家”之嫌。

但是，与塞万提斯同时代的这一干文人不是疏于时机，便是流于肤浅，以至于沉溺于骑士文学的各色人等对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用塞学家金塔纳的话说，“要扫除此等瘟疫，非猛药不可也”，“当然时机也很重要”。^⑤

其次，塞万提斯并没有将小孩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虽然他在作品中抨击了骑士文学，却并不打算丢弃骑士风范，尤其是其中的理想主义精神。而且他很清楚，骑士小说也并非一无是处。事实上，近现代不少诗人作家正在使中世纪的这些故事复活，他们热衷于描写战斗，一如18世纪的沃尔特·司各特以及20世纪的霍尔金、罗琳等许多作家。塞万提斯若是看到了他们的作品，准会视同骑士文学，尽管可能是他心仪的骑士文学。这是说，塞万提斯之目的并不在讽刺骑士精神以及骑士小说的全部内容，而是要肃清其中之夸夸其谈和不实之词。他在第一部第47和48章中，借教长之口说：“我实在觉得所谓骑士小说对国家是有害的。我有时是无聊，有时是上当，几乎把这种小说每本都看过一个开头，可是总看不下去，因为千篇一律，没多大出入。我认为这种作品……都荒诞不经，只供消遣，对身心没有好处，和那种既有趣又有益的故事大不相同。尽管这种

书只用作解闷消遣，可是连篇的胡说八道，我懂能有什么趣味。人要从实际或想象的事物上看到或体味到完美、和谐，才会心旷神怡；一切畸形的东西都不会引起快感。如果小说里讲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挥剑把一个高塔似的巨人像杏仁糕那样切成两半，或者描写打仗，敌军有百万之众，而主人公匹马单枪，准获全胜，不管读者信不信，这种小说怎么能动人呢？……或者写一个王后或女皇，见到素不相识的游侠骑士，就投身到他怀里，这样有失体统，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呢？”此外，“虚构的故事必须得到读者的理解与首肯，变不可能为可能，变庄严奇崛为平实可亲，这样才能引人入胜，达到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令人既惊奇又愉悦的效果。不过，不懂得逼真描摹自然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这恰恰又是创造完美艺术的前提。但我没见过哪部骑士小说能够称得上部分和整体协调一致的。它们连起承转合都做不到，哪里还能首尾呼应、前后相承呢，而往往是些七拼八凑，似乎作者有意要创造出个妖魔鬼怪来。”

至于骑士小说的好处，塞万提斯说，“那就是它为有才情、有想象力的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可以任由挥洒，描写什么海难呀、风暴呀、格斗呀、搏杀呀；刻画出十全十美的将校，他不仅足智多谋，能识破狡猾对手的神机妙算，还巧舌如簧，颇能循循善诱、鼓舞士气，而且既能深思熟虑又可当机立断，能攻能守；或者时而是可歌可泣的场面，时而是令人喜出望外的情景；还有美貌纯真、聪颖守礼的仕女，精诚虔敬、勇敢机警的骑士；或者狂妄粗俗的牛皮大王，英明睿智、英勇无畏的君王；或者善良忠诚的臣民，高尚慈祥的爵爷。作者甚至可以炫耀其非凡的学识，如星象学或地理学，或者高超的音乐和行政才能，或者兴之所至当一回魔法师……总而言之，他可以将这些优秀品质集于一人之身，也可以将它们分摊在众人身上，只要笔触超逸，构思巧妙，而且尽可能生动逼真，就一定会写出色彩斑斓、美轮美奂的作品来。一旦完成，必然美妙绝伦，既给人以教益，又悦人至深。我说过，这才是天下文章应当追求的最高旨趣。通常，这类书籍用的是散文体，作者可以自由自

在地写出史诗、抒情诗、悲剧、喜剧，总之是文学和修辞所能涵括的一切门类。”

事实上，《堂吉珂德》亦步亦趋地戏仿骑士小说的过程，恰恰既是批判，也是继承。

此外，《堂吉珂德》也并未使骑士小说销声匿迹。即使在这个时候，骑士小说还是照样出，照样流行，而且其数量较之特兰托教务会议之前竟毫不逊色。据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官方网站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堂吉珂德》之后仍时有骑士小说出现，而《阿马迪斯》等较为流行的作品更是反复再版或重印，直至17世纪末。

二、《堂吉珂德》的经典之路

如果说反骑士小说是时代的需要，诸多反骑士道著作是历史的必然产物，那么塞万提斯及其《堂吉珂德》呢？虽然历史是既成事实，不能假设，但这一个塞万提斯及其《堂吉珂德》的偶然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金塔纳说过：“人们如此沉溺于斯，必得有相应的时机和高招才能令其迷途知返。倘无娱人之术，便不能将娱人之害驱逐；倘无令人耳目一新之书，便不能取代五花八门的传奇故事。《堂吉珂德》充满创造性、想象力和哲理之光辉，并基于真理和审美之原则，终使雅俗共赏、皆大欢喜。”^⑥然而，恰恰是这样一部充满创造性、想象力和哲理之光辉并基于真理和审美之原则的巨著，竟并未被同时代人所认可。

我总是夜以继日地劳作，
自以为具有诗人的才学，
怎奈老天无情毫不理会。^⑦

这是塞万提斯对自己的总结，它出现在1614年的长诗《帕尔纳斯山之旅》上当非偶然，因为事实上塞万提斯一直未能跻身于西班牙“黄金世纪”大诗人的行列。用当时文坛泰斗洛佩·德·维加的话说，简直“没有比塞万提斯更糟糕的诗人，也没有

哪个傻瓜会喜欢堂吉诃德……”在一首致塞万提斯的十四行诗中，洛佩更是竭尽揶揄贬抑之能事：

……

堂吉诃德何足挂齿，
光着腩子到处乱跑，
只会兜售姜黄笑料，
唯有粪坑是其归宿。^⑧

虽说洛佩的疾言厉色只是个别现象，但时人确实未能发现《堂吉诃德》的真正价值，故而普遍视其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遣闷、逗乐之作。谁也没把他（堂吉诃德）视为值得尊重的严肃人物；恰恰相反，他们拿他作笑柄。

此外，对《堂吉诃德》的戏仿之作蔚然成风。其中阿隆索·费尔南德斯·德·阿维利亚内达的《堂吉诃德第二部》就严重歪曲了堂吉诃德的形象。围绕阿维利亚内达的真实身份，学术界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探讨与辨析，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除洛佩·德·维加之外，卡斯蒂略·索罗尔萨诺、利尼安·德·里亚萨、路易斯·德·阿利亚加修士、萨阿拉斯·巴尔巴迪略、赫罗尼莫·德·帕萨蒙特、蒂尔索·德·莫利纳、格雷戈里奥·贡萨莱斯等，都曾是怀疑对象。同时，随之产生的还有众多善意的仿作，如纪廉·德·卡斯特罗的同名长篇小说、卡尔德隆的同名喜剧，等等。著名学者梅嫩德斯·佩拉埃斯称类似仿作仅17、18世纪西班牙就达三十余种。

且说阿维利亚内达在“序言”中为自己辩护并公开污蔑塞万提斯，说他“早已老朽，堪比圣塞万提斯古堡。近年来他总是求全责备、闷闷不乐，无论何人何事都让他心绪忿忿。因为如此，他孤家寡人，朋友全无。就算要写献词，也必得临时招募干亲……知足吧，抱着《伽拉苔亚》和那些散文体喜剧过活吧，别再拿小说丢人现眼：快烦死人啦！”^⑨

无独有偶，赫罗尼莫·萨拉斯·德·巴尔巴迪略也于1614年抛出了他的仿作《准点骑士》。此作除了歪曲堂吉诃德的形象，

还刻意创造了一个毫无理想主义色彩的投机分子。这个所谓的骑士使出浑身解数，只为混迹宫廷、跻身于上流社会，但最终免不了戏法被人戳穿的尴尬和落魄，以至于不得不回到乡村，在极度的孤苦和潦倒中终其一生。他在致堂吉诃德的信中，谓斗巨人、荡城堡并不难，“难的是面对此时此地的所有不幸，并同各色人等及其丑恶、愤怒与傲慢作不懈的斗争。因为，唯有这些恶行与恶习才是真正的、强大的敌人”。^⑨

由此可见，《堂吉诃德》并未被同时代人所认可，而是多个世纪以后才真正踏上经典之路的。这个过程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首先，塞万提斯创作《堂吉诃德》并非一蹴而就的神来之笔，而是走投无路的偶然之作。其之所以偶然，是因为小说在当时尚属不登大雅之堂的末流艺术。莫说一般大诗人不屑于此，就连塞万提斯也心知肚明：自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就是说，塞万提斯的生平及创作道路将他引向了这块不毛之地，其中的冒险成分和游戏色彩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第一部第六章里，神甫和理发师检查了堂吉诃德的藏书，其中竟有一本塞万提斯自撰的《伽拉苔亚》。不宁唯是，那理发师居然还是作者的老朋友，他对此书的作者并不十分佩服，认为他与其说是多才，不如说是多灾；他还说这本书开头写得不错，但结局还不得而知，书里有些想象也还算新奇。理发师是塞万提斯想象的产物，却评点起塞万提斯来了。

用塞学家本胡梅亚的话说，《堂吉诃德》正是塞万提斯人生经历的写照。“身体羸弱，却意志坚强”；“在童年时期，塞万提斯就喜欢阅读骑士文学，对冒险故事充满了好奇，并萌发了最初的匪夷所思的英雄梦。在青年时代，他的所有人生计划和美梦都一个个地破灭了，没有奖励，没有勋章，只有失望和失败。金塔纳说过，《堂吉诃德》是灵感的产物，是自然的造化。里奥斯则认为它是塞万提斯拉曼恰之行的偶得之作……”本胡梅亚甚至认为，塞万提斯的作品完全是对其生平的象征性表现：“……他受不幸之星的刺激和鞭策，注定要同可恶的敌人、无耻